

# “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敖 凯

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抗日战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抗日武装。四川博物院陈默认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内部关于缩减兵额的论争,反映了国民党军在数量和质量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首都师范大学冯一鸣分析了常德会战不同阶段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作用与不足。北京大学郭宁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青年成功地进行吸收、教育和使用,大体实现了中共军队“知识青年工农化”的目标。姜涛认为太行根据地民兵、自卫队的动员与组织,体现了基层中共权力架构中武装、生产与政治的高度有机结合,中共通过人民武装可更稳固地掌握基层政权。战争的官兵伤残是一个事关战争能否为继、何以为继的重要问题,山西师范大学李常宝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经历了从伤残收容救治到诊治后分类处置(伤愈归队和残废收容安置)的过程。这体现了国民政府对为国奉献而伤残的官兵承担的政治道义与责任,但比照残废官兵实际人数与收容安置人数,国民政府的收容远未达到旌表“为国成残者”的实际功效。

二、抗战时期的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以冀中救国公粮为考察对象,认为通过统一原本杂乱无序、政出多门、没有统筹统支的公粮和财政税收体系,既解决了财政收入问题,也没有明显增加人民负担,使冀中成为“不怕拿,就怕乱”的根据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张焱明,探讨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厦门大学王明前考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华东师范大学邹铖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棉纺织业建设的起因、经过进行重新梳理,认为该地区是抗战期间中共发展农村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山大学柯伟明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认为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详细分析了抗战时期西北面粉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

三、抗战时期的外交。北京大学马思宇认为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执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州交涉中的基本策略及实践。张展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政策变化为考察对象,认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既有政、军在大目标上的一致性,又有在实行方案和主导权上的竞争性,展现了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复杂性。复旦大学潘星认为蒋介石在处理济南事件上既有对日妥协、退让的一面,又有不乏强硬的一面。南京大学孙扬梳理了从1943年1月中英新约签订后到1945年8月英国重占香港之前,中英两国因应形势、制定规划、筹谋决策的若干细节。华东师

范大学韩长青以1945年9月召开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为中心,梳理了中国在五国外长会议框架下真实地位的缘起及演进,分析了中国在和约筹备过程及大国利益冲突格局中的处境。

四、人物及群体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认为1940年马寅初被捕事件的发生是马寅初与国民政府关系从亲密到疏离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危难与国共相争之际,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的复杂心路历程。辽宁社会科学院王春林,认为抗战时期金毓黻在乡党与学派之间的游走反映了彼时大学的校园生态,展现了其对个人交往圈层的权衡,折射出东北流亡人士的生存状态与桑梓关怀。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认为抗战时期四川人和下江人之间存在的大量矛盾和冲突,极大地改变了大后方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也影响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北京大学谭皓认为近代日本军方于1873年末派出的首批留华学生,实为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的前奏,标志着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遣军官来华留学、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阴谋就此展开。暨南大学张传宇认为日军占领广州后,日本居留民的人口迅速增长、战前主要机构得以恢复,并且利用占领地统制机构控制了各个主要行业,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日本居留民由盛转衰,最终被糅合到日本占领当局的统治机构当中。

五、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华东师范大学蔡炯昊通过考察国共两党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论争,认为在抗战后期的特定语境中,一种历史记忆只有在符合政治权力拥有者意图时,才有机会广泛传布,并在传播过程中纳入到接受者的固有心智和社会文化结构中。湖州师范大学王森认为卢沟桥事变后,中外基督教会的反应呈现出一幅纷乱多歧而又趋向盼望和平的图景。

六、伪满洲国研究。北京大学郭鑫认为伪满洲国的军事援助政策的变化,最终都与其向高度国防国家准备的过程息息相关,也是日本的总体战体制构筑通过殖民地完成补充的过程。哈尔滨师范大学孙瑜,认为伪满洲国的水泥工业具有垄断性、不平衡性和先升后降的特点。

七、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王艳勤认为20世纪40年代鄂西南财产法秩序,是在民间与国家力量的综合较量中形成的。西南大学赵国壮考察了战时后方手工行业融资活动,认为既要肯定战时大后方金融网的建立,金融业促进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认识到金融业转型过程中的隐忧和暗流。复旦大学赵峥梳理了抗战时期西康省境内彝族同胞参与乐西公路修筑的过程,认为筑路和通车前后,在各股政治势力的互动之中,彝胞对抗战的贡献得到充分肯定,彝族的民族形象得到正面展现,使得彝胞对国家的认同和对自身民族的认同都得到增强。

八、战争责任及战后遗留问题。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通过比对资料,认为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战争责任的判决并无不当,其所做申诉基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狡辩。辽宁社会科学院关亚新认为东北国民党控制区遣返留用的日籍技术员工,虽人数不多,但耗时较长,在当时形势复杂、交通困难、费用巨大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遣返任务,为抗日战争画上了句号。

综观研讨会可谓是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征文期间,青年学者踊跃投稿,论文达86篇,可圈可点之作甚多。因会议规模所限,只有30位作者受邀参加,他们年龄都在45岁以下,最年轻的只有23岁,充分体现了研讨会的青年学者特色。在两天的会期中,简洁明了的开幕式、充分的讨论时间、与会知名学者的悉心指点令人印象深刻。这对开拓抗战史研究新边疆、培养青年学者、壮大研究队伍、推动“大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敖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编辑〕

(责任编辑:徐志民)